

超九成受访大学生愿意为方言的传承和保护出力—— 让乡音有处可诉乡愁有人能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仟煜 程 思
实习生 孙子骐 李永熙

“筷子在闽南语里是‘箸’，和李白《行路难》中‘停杯投箸不能食’的‘箸’是同一个字。”林洁介绍着自己的家乡话——闽南话。“房屋在闽南话中读是‘厝’，眼珠是‘目珠’——这些都是现代方言与古代汉语相通的例证。”

林洁来自福建漳州，是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大四学生，也是该校闽语社的创始人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像林洁这样喜爱乡音、主动传播方言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或组建社团、举办方言赛事，或借助短视频、AI技术创新传承形式，让曾被一些人视为“土气”“过时”的方言，成为青春表达里的鲜活符号。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发起“方言认知、使用与保护意愿调查”，共收到3360份有效问卷。数据显示，96.55%受访大学生对方言感兴趣，62.11%受访者非常希望从方言中更深入地了解家乡的文化根脉，98.90%受访者表示愿意为方言的传承与保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乡音藏古韵

2024年，林洁选修了“闽南方言专题研究”课程，推开了一扇了解家乡话的大门，也通过这门课，成为学校闽语社的创始人之一。这一年，该课程的任课教师许彬彬根据学生所属的籍贯，找到包括林洁在内的5位土生土长的闽南人，作为社团成立的骨干。

“我们习以为常的乡音，承载着如此厚重的文化记忆，当代青年有责任传承、保护好闽南话。”这是闽语社第一任社长在申请表上写下的申请理由。最终，闽语社在学校团委的支持下，于2024年正式成立。

起初，社团招募了五六十人，但真正能参与社团活动的只有15人左右。“北方同学听闽南话像‘听天书’，有些同学上了几节课就退课了。”林洁说。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闽南话，闽语社参与举办了学校首届闽南语诵古诗大赛。2024年首次办赛，就吸引了来自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三明学院等高校的120余名选手报名。

决赛现场，闽南语版《李上邕》《将进酒》《长沙过贾谊宅》等古诗在赛场轮番上演。有同学演唱经典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厦大中国语言文学系还邀请到几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答嘴鼓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答嘴鼓民俗演出。

今年，比赛从校级升级为省级，结合厦门大学独特的地缘优势与深厚的文化



底蕴，与金门大学、台北大学、台北教育大学等高校紧密合作，目前比赛在初赛阶段。

数据显示，38.24%受访大学生精通方言，31.76%可实现熟练的日常交流，还有24.49%的受访者表示“能听懂但说得流利”。在此背景下，方言社团、比赛等成为大学生认识方言、传承方言的重要平台。

资料显示，普通话与方言同根同源，皆扎根于古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先秦时期的“雅言”、秦汉至隋唐时期的“通语”、宋元时代的“中原雅音”、明清时期的“官话”等，既为普通话的形成奠定基础，也推动了方言的发展，二者共同构建起汉语语音文化的传承体系。

在林洁看来，普通话的作用是“打破地域交流障碍”，而方言则“承载着传承地域文化、历史的作用”，二者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丰富的语言生态。林洁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同学，祖籍是福建莆田，“他会讲闽南话、普通话和马来语，对中国的认同感很强。”林洁说，她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留学生，闽南话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家乡话”。

在让渡于普通话的同时，方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林洁说，她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留学生，闽南话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家乡话”。

方言里的文化基因

对于在外地上学的大学生而言，家乡话承载着乡忆，更是一种身份认同。调查显示，77.56%的受访大学生认为，说方言“很亲切，是家乡身份和情感的纽带”。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西客家人，卢海宝与客家话的缘分，从出生那一刻便已注定。在广西玉林博白县，客家话是当地

受访者或身边同龄人为方言的保护与传承做过哪些事情：	
主动向长辈学习地道的方言词汇或谚语	56.43%
自己有意識地在特定场合多说方言	48.48%
录制、创作或转发过与方言相关的内容(如视频、音频、文章、方言配音大赛)	30.77%
参与过与方言保护相关的社团、志愿活动或调研	19.05%
暂时什么都没做过，但未来可能会考虑	26.28%
什么都没做过，也觉得没必要	2.44%

许多居民的日常交流语言，对他来说，这不仅“方言”，更是刻在成长中的母语。

小时候，爷爷奶奶用客家话哼着童谣《月光光》哄他入睡，家族聚会时长辈用乡音拉着家常，连邻里间打招呼的“食饭冇”（吃饭没），也是卢海宝童年记忆里不可或缺的场景。

进入大学后，说家乡话的机会少了很多。“现在一周可能就说两三次。”这一变化让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调查显示，38.04%的受访大学生“偶尔使用方言”，超半数的受访者在回到家乡，与家人或家乡的同学、朋友交流时使用方言。

“汝也是客家人咪？”在外地街头听到有人说客家话时，卢海宝总会忍不住凑上去用客家话问上一句。这份亲切不仅源于乡音的牵引，还源于一种深刻的文化共

鸣。“涯爱汝”（我爱你）、“禾埆”（稻田）、“蛤蜊”（青蛙）这类词汇中藏着古汉语痕迹，而那些代代相传的客家故事与俚语，更是通过客家话才得以完整保留。

实际上，我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五大语系、130多种语言、十大汉语方言以及难以计数的方言土语。据一篇于2023年发表在《文化创新比较研究》杂志的文献披露，在我国130多种语言中，有68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48种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25种使用人口不足千人，部分语言仅十几人甚至几人会讲。

数据显示，80.00%的受访大学生对方言的式微感到担忧。但在卢海宝看来，客家话会一直随着客家人的脚步扩散出去。他告诉记者，客家人常说“有热头（太阳）的地方就有客家人”，他的二叔现在在非洲刚果（金）做道路铺设工作，有时会在当地教非洲朋友说客家话；而身边的老乡们，也会在大学老乡群里用客家话聊天，让乡音在异乡延续。

让方言“活”在当下

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更承载着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与地域的文化基因。

卢武是澳门理工大学文化遗产与人类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他从最初的对当地方言“完全陌生”，到现在偶尔能说几句粤语。求学期间，他在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委托项目“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时，发现澳门多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习惯用方言口述技艺传承历程与文化历史。

此外，卢武注意到，参与项目的团队会完整录制传承人的方言口述内容，再由

熟悉粤语的成员将其转化为文字文本，但部分方言词汇的理解必须结合当地文化背景。例如，“派利是”指澳门春节开工等场合派发红包的行为，“睇大戏”是澳门市民对“观看粤剧演出”的日常称呼。

方言不是孤立的语言符号，而是地域文化的“活态容器”。调查显示，96.55%的受访大学生对方言感兴趣，62.11%受访者非常希望从方言中更深入地了解家乡的文化根脉。

同时作为江西科技学院影视相关专业专任教师的卢武，会要求学生拍摄非遗项目或人类学题材纪录片时，尽可能保留采访对象的方言原声，他认为原汁原味的方言表达，能更加真实地呈现地方文化的风貌与内涵。

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诸如“猴赛雷”“中不中”“你睇啥”的方言梗，及各地方言等级测试，引发不少关注。中青校媒调查显示，68.96%受访大学生愿意“用新媒体进行创作（如制作短视频、播客、表情包）”参与方言的保护。

卢武在肯定此类现象的同时，意识到方言传承不能仅停留在“玩梗”或碎片化的体验层面。他认为，要让方言“活”下去，需要引导年轻人系统了解方言背后的文化语境，比如通过高校开设的地域文化通识课、参与非遗体验项目等方式，让方言与地域文化、历史记忆深度绑定。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2024年调查显示，我国有350余家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200多个专家团队参与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一些年轻人也参与了方言的传播和保护。林洁所在的闽语社，与一家热爱闽南话的校外企业合作，开展闽南话田野调查，并建立数据库，用于开发闽南话App。

数据显示，98.9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为方言的传承与保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互联网上，有人用粤语解说足球，用天津方言表演相声、用四川话讲脱口秀……此外，一些企业开发了支持多种方言语音输入的输入法，包括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和各类地方方言。

方言被誉为“地域文化的活化石”，与普通话互补共生。“保护和传承方言不是抑制普通话的发展，只是在推普的同时保方言，给方言留下生存空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汉语言文学教研室教师朱燕萍的观点，道出了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核心。

“希望方言永远‘活’着，能成为年轻人之间的默契和家乡联结的纽带。”在卢海宝眼中，客家话不是被封存在博物馆里的“遗产”，而是能用来拉家常、唱童谣、说“涯爱汝”的“活语言”。哪怕走得再远，听到一句“汝也是客家人咪”，便能瞬间找回那份亲切感，“希望乡音永远有处可诉、乡愁永远有人能懂”。



武汉大学书画协会(学生)

武汉大学书画协会（学生）可以溯源到1981年创办的武汉大学书画社，后于1983年正式成立，是一个以书画为载体的兴趣社团。40年里，社团多次举办樱花笔会、珞青赛等大型活动，并举办校内书画展览和书画讲座。社团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与校级荣誉。



西南大学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讲团

西南大学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讲团成立于1997年，是理论学习型学生社团。学生宣讲团以“立足校园，服务社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者、宣传者、实践者”为宗旨，依托学科优势，通过快板、情景剧和漫画等多元形式，助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同时推出系列线上理论宣传精品栏目。近5年来共开展主题宣讲活动100余场，曾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等多项荣誉。



西南科技大学含章汉文化协会

西南科技大学含章汉文化协会成立于2011年，协会一直秉承着“始于衣冠，达于博远”的初心，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从多方面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贡献。协会以汉服为载体，结合各种传统节日，积极举办活动，如花朝节、华服日，中秋、冬至等主题活动，让同学们了解和学习了更多传统文化知识，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



南通大学“行知之约”青年实践成长社

南通大学“行知之约”青年实践成长社成立于2022年，以“提升社会实践技能”为主线，通过社会实践项目策划大赛、“馨行计划”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朋辈交流论坛等品牌活动，促进社团成员走进社会、体验社会、融入社会。社团自主编写《大学生社会实践实务手册》，开发并搭建寒暑假社会实践团队双选平台，带领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浙江工商大学艺鸣音乐协会

浙江工商大学艺鸣音乐协会成立于2007年，作为全能型音乐组织，配备全套专业录音设备和音乐工作室，专注在校内孵化多元化音乐人才，涵盖演唱、舞蹈、乐队及原创音乐等多个领域。

复旦中文系师生坚持20余年开展方言调查——

在田野间打捞即将消失的“语言记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实习生 罗 政

一只沿海居民餐桌上常见的海蜇，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的方言里，还是人们熟悉的“海蜇”，但到了浙江台州以南和福建地区的方言中，它却有了“𩶇”（读音为“炸”）鱼”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毗邻不同的差别同一种东西的表述，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别？

跟随复旦大学中文系方言调查团队在岱山调查时，复旦学生匡一龙从当地的方言发音人和调查团队指导老师陶甬那里了解到，处理海蜇时要先剥掉带有花纹的外皮，根据当地人的发音推断，这种外皮的叫法可能是“花蛇衣”，剥掉皮后的光滑透亮的部分则叫“白蛇”。陶甬解释说，岱山人过去很可能也把海蜇称作“蛇鱼”，一些外来词汇的涌入让它变成了“海蜇”，但食物制作方法中的细节，却保留了方言演变的蛛丝马迹。

匡一龙今年读大四，大学期间的寒暑假，他数次跟随团队到浙江、福建等地开展方言调查。这种本科生参与田野调查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陶甬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因为看到“汉语方言学”课上同学们的科研热情，他向中文系申请，利用暑期带一批学生开展方言调查，让同学们在实践中熟悉语言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田野调查方法。系里批准了项目和经费申请，陶甬带着一届又一届学生，开启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方言“寻踪”之旅。

循着一字一句中的“草蛇灰线”探秘，要深入方言最地道的村镇街巷，找到发音最地道的人。这是一项被戏称为“求爷爷告奶奶”的工作——寒暑期的调研工作，师生团队需要连续工作10天左右，每天调查数个小时，想找到能配合调查的

发音人就是难题；方言地道的发音人往往是年长者，对同学们来说大多是真的“爷爷奶奶”，还有人只会讲方言，沟通起来同样不易。

但田野调查就要配合“田野”办法，既要严谨的科研规范，又要灵活的应变能力。为了应对有些发音人不熟悉普通话的场景，他们会提前准备好一些物品的图片，请发音人直接“看图说话”；除了对照全国通用的调查字表，一一询问发音人各个字词的发音，师生们还会根据经验和调查中的实际情况进行补充。

复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盛益民颇为佩服陶甬在多年经验积累中形成的一套调查方法。“单用调查字表，陶老师就可以调查出一系列衍生品。比如遇到‘伞’字，除了问‘伞’怎么读，他还会问当地有几种伞，再拿出一把伞，问伞的各个部件怎么说，制作过程是怎样的，日常中如何用伞，撑开伞、打着伞等动作都怎么说。看似是一个字，却可以生发出几十种表达，靠一本调查字表，甚至有可能得到一万多个词条，一部方言词典也就诞生了。”

“田野”是一部无字的书，记录着人们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变迁。初入田野，在城市长大的复旦博士研究生陈璟桁经历了不少“打破幻想”的时刻。“我们的调查大多在农村，而我对农村生活、农业生产几乎一无所知，很多常识性的东西都要从头学起。”他对一次调查中“饱满”一词的含义印象深刻。“内陆汉语里有这个词表示饱满，它不仅形容谷物饱满，还能表示鸡蛋是否受精。”鸡蛋受精才能孵化成小鸡，这在农村是极为常见的概念，对他来说却十分陌生，“那一刻我才明白，方言里藏着太多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细节。”

语言的世界里，一炊一饭、一枝一叶，背后都有深意。在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人们会在米汤里点缀淡紫色的木槿花，喝着米汤，师生们一下就理解了当地

人将木槿花称为“饭饮花”的原因。

2008年时，盛益民还在南开大学读本科，认识陶甬后，他申请跟随陶甬师生团队一起参与田野调查。在赴浙江庆元的调查中，他得知用来舀水的“勺子”在当地话里被称为“稀”，当地发音人还介绍，早在晋代，郭璞在注《方言》时便有相关记录。这种与历史对话的玄妙让盛益民感慨：“你突然通过一个声音，和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建立了连接。我们正在听的，有没有可能就是晋代人耳中的乡音呢？”在各地的调查中，陶甬和盛益民陆续发现，“稀”字不仅在福建地区、浙江南部应用广泛，在绍兴等浙北地区方言中也都使用，它作为古江东方言，很好地证明了吴语和闽语的同源关系。他们据此和后续的研究发现，提出了“共同吴闽语”这一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除了发现未知的乐趣，匡一龙还渐渐体会到了方言研究背后的深层价值。“方言不只是沟通工具，更藏着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完整的乡土记忆。”他举例说，有的方言里手肘和膝盖是“手盔子”和“脚盔子”（此处“盔”为记音字），他意识到，“盔子”表示的都是肢体关节的节点；有的方言把眉毛叫“眼眉毛”，则体现了人们对人体部位关联的认知。

在田野里，学生像禾苗一样飞速成长。陈璟桁已经总结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在村里做会计工作的发音人往往容易沟通，他们逻辑清晰、理解能力强，还会普通话，交流起来很方便。”更让他佩服的是，这些会计能举一反三，“你问田地怎么说，他会主动告诉你秧田、山垄田等的说法；问犁地的犁，他会把犁的各个部件的名称一一说明。”

高三毕业后的暑假，匡一龙第一次参加方言调查，后来的两三年里，很快具备了独立调查的能力。在盛益民看来，他的学术能力已经不亚于很多硕博，这与参

与方言调查有很大的关系。不久前，匡一龙作为在安徽师范大学举行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二十三届年会上唯一入选的本科生，介绍了自己的新近研究。今年，他还顺利直博。

20多年中，许多参与过方言调查的同学已经或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中流砥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盛益民、副教授史泽辉都曾是调查团队中的学生，如今，他们转变角色，成为带队指导老师。回溯到方言调查起步的2004年，陶甬细数，那一年参与调研的学生中，有一位现在是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副教授，在日本的中国语学界颇具影响力；还有几位同学，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任教。

据不完全统计，参与复旦方言调查的本科生、研究生已超过350人，其中硕博人数近50人。他们中，至少有8人在海外高校任教，32人在国内高校任教，有十多人在海内外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还培养出5名国家级人才。这一本科生拔尖人才培养机制，也已影响到海内外多所高校。

最纯朴的田野，也是催生重大社会科学成果的沃土。依托历年的方言调查成果，团队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1项、青年项目2项，以及多项省部级项目。累计形成田野调查报告40余份，数十篇论文发表于《中国语文》《方言》及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等海内外权威期刊。团队主导的“吴语重点方言研究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和“汉语方言类型比较研究丛书”（中西书局）已经出版著作10余部。

20世纪20年代，后来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开创了我国用现代方法记录方言的先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仍坚持深入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地开展田野调查；到了20世纪50年代，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开展，陶甬的